

开卷丛书

六朝悲音

魏晋南北朝诗歌卷

党圣元 编著



秋风起兮佳景时
吴江水兮鲈鱼肥
三千里兮家未归
恨难得兮仰天悲

陕



出版社

开

丛书

六

悲音



魏亚

北朝诗歌卷

党圣元 编著

秋风起兮佳景时，
吴江水兮鲈鱼肥。
三千里兮家未归，
恨难得兮仰天悲。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 开卷丛书 ·

六朝悲音

——魏晋南北朝诗歌卷

党圣元 编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陕教社照排室排版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8.625 印张 4 插页 200 千字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1—11,000

ISBN 7-5419-6570-7/I·306

定价: 11.90 元

面对绵延的高山巨灵

杨匡汉 汤学智

人生需要两种空间——物质的空间和精神的空间。作为文明之花的文学，为人类生存提供着广阔的精神空间。

人的生命如逝水，一去而不复返。惟文学与艺术，往往可以追回人们曾经有过的生命体验，或进入另一种足资向往的可能的人生。正因为如此，当你工余饭后，案前榻下，一卷在手，古往今来，神游物外，可增长知识，陶冶性情，滋润生命，抚慰心灵。阅读好的文学作品，有如良师耳提面命，如友朋品茗夜话，如情侣倾诉衷肠，亦如听风听雨过清明……故古人有“开卷有益，不以为劳”之说。作为一个现代文明人，企望视野的开放和精神的拓展，那就应该对文学、尤其是本民族文学，有深入的了解和体认，从而进至文明度更高的精神生活之中。

当你开卷时，你所面对的文学世界，内涵是十分丰富和浩瀚的。

从本质论角度看，文学是人学，也是心学。它是人的生命的律动；心灵的歌唱，是人的情感和智慧孕化的产物，是人的具有无限创造潜能的本质的自由显现。文学离不开人，离不开人的内在精神。在社会生活中，凡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文学；有什么样的人群，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而且，只要人类还将继续生存发展下去，文学之花也一定会愈开愈鲜艳。在文学的内涵中，最深刻的便是它所体现的人的内在精神的普遍性底蕴；同时，由于任何人群，任何民族，都是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生成、发

展和演化的，并由此铸造出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民族个性，故而文学又自然地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殊的民族风貌和文学精神。

从本体论角度看，文学是承载生命信息的语言建构。在长期的文学积淀中，形成了由各种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文本构成的文体系统。以文体类型而论，文学由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等基本类型构成；以审美需求而论，有俗文学与雅文学之别；以创作流程而论，又有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分。所谓民间文学，是指由人民大众集体创作，反映民众生活愿望，并用口头演说的形式，在人民大众中间世代相传的口头文学。所谓通俗文学，是指用通俗的书面语言形式表现大众所喜爱的通俗内容的文学作品，大都流传于都市市民中间，也可称为市民文学。所谓雅文学，是指由具有丰富文化修养的作家创作，用比较高雅的艺术语言形式，表现某种比较深沉的人生体验和复杂的社会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层次与功能不同的各种文学共生互补，相辅相成，构成了文学的百花园。每一种具体文学样式，每一部文学作品，也都有自己的灵魂与血肉。正是这些众多的“生命”，建构起文学的生命系统。

从发展论角度看，在历时方向上，文学随着人类文明的进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共时形态上，它又包含了全世界不同民族地区，不同发展程度的文学。同时，它还是一种正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活的文学，人类正在不断地把自己从现实发展中展示出来的新质注入其里。因此，我们看待文学，必须站在本民族以至全人类共同创造所积成的巨大精神财富上，既不能割断古今，也不可划地为牢，对文学的传统予以充分的尊重，对文学的创新持宽容的器度。

《开卷》作为普及性的大型文学丛书，旨在重点介绍和阐释中华民族文学，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为有助于读者阅读，有必要

对中国文学的常识，作一些说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已有 5000 年的文明史。中国文学同中华民族一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在历史发展中，汉民族文学始终居于主导的和中心的地位。还在文字发明以前，汉民族的文学就以神话和传说的形式，在人民口头诞生并流传了。像“女娲神话”、“羿神话”、“大禹传说”等。这些独具特色、有永久的魅力的上古神话传说，足以同世界上最优秀的神话传说媲美。

中国文学的发展，一般按照历史分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

古代文学，上起先秦时期的西周，下至 19 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前后 3000 余年。

诗歌是产生最早、发展最充分、成就也最为辉煌的一种艺术形式。中国有“诗歌大国”之称，古代诗歌以《诗经》和《楚辞》为源头。前者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后者以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的《离骚》为代表，气势磅礴，想象奇特。古代诗歌发展到唐宋时期，进入黄金时代，诗人辈出，诗篇累累，形成了以律诗为标志的近体诗。宋元之间，同诗有着密切联系的两文体“词”和“散曲”，得到长足的发展，甚至分别成为宋、元时代文学的标志，故有“宋词”、“元曲”之说。词和曲是诗与音乐结合的产物。它们比律诗更为自由、灵活，利于传情达意。

古代文学中发生较早的还有散文。散文的源头可推先秦时期的《周易》、《尚书》、《春秋》、《左传》及《庄子》等诸子散文。古代散文的发展有三个重要阶段。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百家争鸣中的诸子散文；二是唐宋时期的“古文运动”，涌现了“唐宋八大家”；三是明清时期，诸如“竟陵”“桐城”等流派的散文，均异彩纷呈。

古代小说出现和发展较晚，这同它长期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

“邪宗”有关。小说虽萌芽于汉魏六朝，唐（传奇）宋（话本）时期均有所进步，但比较繁荣发展的局面，直到明清两代才出现。这是那时城市经济发展的结果。明代主要是“拟话本”和通俗体长篇章回小说，如《水浒传》、《三国志演义》、《西游记》等，此期还出现了我国第一部以描写日常家庭生活为中心的小说《金瓶梅》，以及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等。这些作品的出现，标志着小说已从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转向描写现实社会的寻常生活，从而进入一个新的艺术领域。清代的《红楼梦》便在这一艺术方向上，达到了古典小说的高峰。此外像《儒林外史》等也达到了相当的艺术水平。这一时期的《聊斋志异》，虽同“志怪”、“传奇”一脉，但在对社会黑暗的揭露中，包含着对自由幸福和光明的追求，成为文言小说的高峰。

古代戏曲开端于元人杂剧。杂剧包括“唱”、“念”、“做”等多种戏剧样式，可谓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综合体。它最初以北京（大都）为中心，流行于北方，很快传遍全国。元、明、清，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剧作家和作品。如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关汉卿的《窦娥冤》，王实甫的《西厢记》，汤显祖的《牡丹亭》，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华古国从政治到经济、文化，开始了急剧、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第一个阶段，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史称近代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也称为近代文学。

这一时期，政治上、军事上失败的现实，和西方文化的传入，使得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开始对自己国体的腐朽、文化的落后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在文学上有着明显的反映，最突出的，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代表人物的梁启超、黄遵宪等人提出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在这种主张影响下，

出现了《官场现形记》(李宝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沃尧)、《老残游记》(刘鹗)和《孽海花》(曾朴)等一批以揭露当时社会黑暗为主的“谴责小说”。同时还出现了许多进步的爱国作家、诗人。自此以后,就其主流来看,文学与国家政治、民族命运,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中国社会和文学进入“现代”时期的标志,是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自“五四”运动至1949年,中国的国情十分复杂多变,这给文学以直接的影响。“五四”前后,以反对封建蒙昧主义与专制主义的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为主要旗帜。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工农大众和知识分子随着自身的日益觉醒,要求文学更自觉地表现自己的斗争生活,并且在形式和语言上进一步要求通俗化,大众化。30年代后期开始了抗战文学时期,其中包括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文学,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以东北三省为中心的沦陷区文学,上海的“孤岛”文学,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抗争文学。现代文学时期尽管只有短短30年,但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不仅使它彻底完成了文学采用现代语言表现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内容上的深刻转变,而且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都对传统文学进行了积极的革新和发展,开拓了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报告文学等新的文学体裁,从而使中国文学开始同世界文坛声息相通。这一时期,出现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艾青、曹禺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作家。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当代文学40余年,在大陆,可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颂歌文学”为主潮。到文化大革命,整个文艺园地一片凋零。粉碎“四人帮”之后,“文革”的惨痛事实,促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回过头来对自己的民族和历史进行深

入的反思，这就促成了“反思文学”的出现。到80年代，反思由社会角度进入人的层次，继而又深入到民族的文化心理层次，遂有“寻根文学”之问世。这一时期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些青年作家现代主义和新写实主义倾向的探索。以历史眼光看，“文革”以后的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突破性的开拓和创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是新中国文学发展最好的一个时期。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还包括同一时期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文学。台港文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学的一部分，在与大陆相异的特殊的人文环境中生长发展，有其明显的殊相，但同根同宗同文，其人文精神和语言风貌，却与中国文学传统命脉相通。台港地区有不少优秀的作家和作品。理应纳入“开卷”者们的视野。

中国文学又具有多民族性。除汉族外，尚有55个兄弟民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情况比较复杂。有些民族，如藏、蒙、维吾尔、哈萨克、纳西、彝、满、柯尔克孜等族还出现了能以汉文写作的著名作家，如杂剧作家李直夫（满族），散曲作家贯云石（维吾尔族），杂剧作家杨纳（蒙古族），词人纳兰性德（满族），作家尹湛纳希（蒙古族）等。从总体上看，少数民族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其中影响较大的，除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世界著名的英雄史诗外，还有维吾尔族的叙事长诗《福乐智慧》，傣族的《召树屯》、《娥并与桑洛》，彝族的《阿诗玛》，蒙古族的《嘎达梅林》，以及苗族、侗族的诗歌等。这些少数民族文学有如璀璨的明珠，与汉民族文学互相辉映，把中国文学的花苑装点得绚丽多姿。

中国文学历经了如此漫长的旅途。这片故国神州，是它丰腴的精神沃土，一代接一代地生长出文学之树、艺术之果。这世代相续，不断繁荣的文学艺术，恰似绵延的高峻山岳的巨灵，震撼着，也温暖着人与人生。我们为之自豪的还在于，中国各民族之

间文化精神历来互相交流和影响，从而为文学的民族融合、艺术发展不断开辟着道路。中国文学中的民族精神始终是鲜明的、无可替代的。这也使中国多民族文学的人文精神有其极为丰富的包容性，体现出举世公认的博大深远的气象。

基于上述的认知，《开卷》丛书力图以科学的态度、历史的眼光、深入浅出的叙述，系统而又简要地向广大读者介绍中华民族文学的基本脉络和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之精萃，以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为达此目的，丛书诸卷取以“文”为主、“文”“史”结合的编著体例，即侧重精选作品和文本导读，同时对所涉及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品类的概貌特征、价值等进行史的分析。全套丛书共24卷，其中包括外国散文、小说、戏剧各一卷，旨在为我们提供一种参照和借鉴。编著者均为在各自学术领域里耕耘多年的老、中、青专家学者。尽管如此，这套丛书仍然难以呈现无比丰富与恢宏的文学景观，但愿它作为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的人生伴侣，相随“开卷”者们步入辉煌的文学殿堂。

1993年夏 北京

前言

党圣元

在中国历史上，从公元二世纪末建安时期到公元六世纪末隋灭周亡陈这四百余年的历史阶段，习惯上被称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或六朝时期，其中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因相继建都于建康而被称为南朝六朝，曹魏、西晋、后魏、北齐、北周、隋，因建都于北方而被称为北朝六朝。一般所谓六朝，则兼指南北六朝而言。

六朝时期是一个大动荡、大分裂、大组合的历史阶段，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经历了一场不小的变化。在这一历史空间和文化氛围中产生的六朝诗歌，是六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时代风气的制约和传统的渗透影响下，六朝诗歌以其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和卓特的艺术成就而展示出独特的美学风貌，从而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最具魅力的发展变革阶段之一。

六朝时期，南北对峙，兵连祸结，动荡不定，门阀制度盛行，阶级鸿沟愈深，民族冲突空前加剧。由于中央政权崩溃，导致整个国家群龙无首，军阀拥兵自重，割据势力自行其事，天下鼎沸，生灵涂炭，死亡阴影追随着每一个人。又由于传统的维系着人心的社会共同理想的消失，导致思想上漫无所归；儒学衰颓，佛道大兴，玄风炽盛，形成了一代社会思潮，深刻地影响着上层社会一代人的精神风貌。时代风气和命运遭际塑造了包括六朝诗人主体在内的六朝文学主体，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独具一格的六朝文人型态。置身于如此动荡不安的现实环境之中的文人士大夫阶层，

他们的人生道路产生了极大的变迁，他们的价值观念经历毁灭之后又得到了重新构建。汉代的文士们，在独崇的儒家教义的统摄下，一般都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自命清流，迂腐执拗。而六朝文士则有所不同，他们已经从汉代儒生曾经惨淡经营的经学中解脱出来，生活和观念不再受此束缚，并且受玄学本体论的影响，注重思考生与死、人生意义等问题。生命意识的萌醒，拓展了精神的视野，崇尚清峻通脱，看重人的精神风貌，以及崇尚自然，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返回自然、发现自然，希求获致个体人格的绝对自由与感性生命的无限享乐等等，成为时代的风尚。于此紧密相关，消极悲观、颓废享乐的倾向也在日益滋长，士人阶层的生活准则由崇尚玄远而发展为追求狂放，最后沦为放荡不羁，沉湎仙药杯酒，遁入清谈禅道。生命视境的拓展，促进了主体意识的强化，由此而产生的必然结果便是人性的觉醒，且为文学艺术注入了主体生命的活力剂。于是一种抒情性更强、更注重感性生命表现的“纯”文学便产生了。由此而带来的文学创作的飞跃发展，主体意识的加强，个性色彩的突出，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艺术技巧的进步，文学风格的多样化，体裁形式的丰富，这些都是当时创作中出现的新的特点，成为“文学自觉时代”的主要标识，而在诗歌创作领域则表现的尤为突出。

作为六朝人精神样式之一的六朝诗歌，是诗人主体对于自己的时代和人生的吟唱。主体个性的成长，文学本身的价值的被肯定，使得在时代的激荡下情感充盈的诗人们意欲通过写诗而构筑起一座属于自己的精神城堡，而阔大沉重的社会现实，苍凉哀怨的人生际遇，则为诗人提供了坚实的表现内容。于是，兴会标举的诗人们便循着自然、时代、人生的三维向度而缘情体物，营造出一个浓缩了社会自然风貌、熔铸进生命情感体验、传达着时代哀乐的意象世界。如果我们把六朝诗歌看作是四百年民族心灵的

展示，并且依循主体的生命历程、精神指向和情感脉络这一线索加以考察的话，便可以发现诸如青春悲欢、亲情友谊、婚恋情爱、家国乡邦、入世进取、求索抗争、困顿落魄、解脱超越、归趋自然、衰暮死亡等人生交响乐的各个曲部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并且形成了一个既相对独立又互相关联的主题类型，由此而显示了六朝诗歌阔大的生命视境。

六朝诗歌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首先，建安诗歌高唱发踪，带来了“五言腾跃”（《文心雕龙·明诗》）的诗歌发展的新时代。“建安”是汉代的末代皇帝献帝刘协的年号（196——220）。汉末，黄巾起义爆发。这场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王朝的统治，社会呈分崩离析的局面，天下变为一片兵火战乱的苦难之海。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拥兵自强、割据一方的军阀势力，他们之间连年混战，互相兼并，到了建安后期，汉代已名存实亡，逐渐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其中以曹魏的势力最强大。曹魏的政治中心是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南），后来又建都洛阳。文学史上所谓“建安文学”即指以邺城、洛阳为中心的魏国文学，吴、蜀很少作家参与创作。建安诗坛的代表人有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和“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等。由于曹氏父子对诗歌创作的爱好和鼓励，在他们周围聚集了一批多才之士，形成了“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序》）的局面，有力地推动了诗歌创作的发展进步。建安诗人大都经历战乱，饱尝流离之苦，对时代现实和人生命运有着非常直切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再加上他们直接继承了汉乐府和“古诗”的优良传统，因此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在题材内容方面是相当广阔的，除了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以及抒发建功立业、拯救世乱的理想抱负而外，表现游子思乡、思妇闺怨的主题的作品

也非常多，从而多方位地反映了时代和人的命运。建安诗歌在风格上呈现出一种气盛力刚、生动劲健的特点，此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建安风骨”或“慷慨之音”。这一特点的产生是以时代环境和诗人主体悲痛感伤、壮怀激烈的思想情感为基础的。刘勰在记述建安诗歌的特点时指出：“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刘勰还指出这时的诗人的共同特点是“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这里，点出了产生建安诗风的时代机制和主体条件，无不精要。建安诗歌在推动我国诗歌艺术进步方面亦作出了贡献，其具体体现为既保持了质朴爽朗的民歌特点，即所谓“造怀诣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文心雕龙·明诗》），又增加了华丽壮大的因素，由于诗人们普遍注重表现技巧，崇尚文采，因而呈现出浑厚清新、情文兼具的新特点，超越了汉代文人诗的“质木无文”。这一艺术上的新变化促使了诵诗最终从歌诗中明确地分离出来，这在中国诗歌流变史上亦有进步的意义。此外，五言体发展的更加纯熟，七言体亦初步确立，而四言体则成强弩之末，这也是建安诗歌创作中出现的新变化。总之，讲求风骨，崇尚文采，歌诗划界，都是建安诗歌在“文学的自觉”这一时代前提下所确立的文人诗歌的新标识，其后的永明体和唐律都是在此基础上的革新发展。

魏晋之交的正始年间（240——248），诗歌创作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这时，曹氏宗室势力日见衰微，司马氏集团当政专权，他们以残酷的手段排除异己，因此政治黑暗，社会更加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诗人们内心都蕴藏着深深的恐惧，因此大都选择了远离现实、不闻世事的人生态度，以便能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保全自身。这时，思想界的趋势是儒学衰微，玄学兴起。于是，蔑弃名教，企慕老庄，高谈玄理，纵酒狂放，寄情于竹林山水之乡，

便成为一种风气，在诗人中间普遍流行。但是，虽然诗人们力求韬光遁世，远祸全身，养性葆真，但是内心中并没有放弃对自由与解放的追求，满腹的牢骚毕竟按捺不住，因此不时地以“隐而不显”的曲折方式，对黑暗政治加以强烈的抨击，对苦难的人生发出哀怨痛楚的呼号。这些无不反映到了当时的诗歌创作中来。正始诗歌的风格与建安诗歌的“梗概多气”有所不同，一变而为远大遥深、清峻超迈，通常所说的“正始之音”即指此而言，这种风格的形成是以当时的诗人主体的愤世嫉俗、使气任性为基础的。刘勰在评论这一时期的诗歌时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文心雕龙·明诗》），所谓“仙心”，是指正始诗歌中体现的老庄超世脱俗、醉生无为的生命哲学观念，其为不久玄言诗的兴起提供了温床。正始诗歌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他们在继承“建安风骨”传统的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的风格。阮籍继建安之后，进一步巩固奠定了五言体的地位；嵇康则承魏武帝曹操之绪，使四言体又一次放射出余辉。

司马炎于公元二六五年代魏称帝，又先后破蜀灭吴，建立了西晋王朝。西晋政权是世族门阀的专政，从一开始便极其腐朽荒淫，虽然也曾出现太康年间（280——289）的短暂的安定繁荣局面，但是各种社会矛盾却酝酿着一场更大的动乱，终于导致了延续十六年之久的统治阶级内部自相残杀、争权夺利的“八王之乱”，不但给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而且使得北方异族乘机入侵，最后晋室不得不南迁。当时，文士们的精神风貌也呈斑驳陆离之态，他们纷纷沉溺于虚幻的佛陀世客与浮诞的清谈玄学之中，既失去了建安文人们的那种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又缺乏正始知识分子的那种忧愤思广的思想境界。太康时期的短暂安定，带来了文学创作的一度繁荣，出现了许多诗人，但由于时代的变迁，诗歌创作也随之而产生了新的变化，其主要特点是建安诗歌的那种

“梗概多气”的力度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却是词藻美赡、轻绮、靡丽，社会现实内容有所不足，显得较为空虚浮泛，因此刘勰认为这时的诗歌的特点是“采辁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文心雕龙·明诗》），这便是通常所说的“太康诗风”。这一时期的诗人，经常被人称道的有“三张”（张协、张载、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钟嵘曾在《诗品》中赞誉他们的诗歌创作标志着“文章之中兴”。此外，张华、傅玄、郭璞、刘琨等也在创作方面取得了各自不同的成就。西晋诗人中，左思的成就最高，他的诗作，现实色彩颇为浓厚，笔力清拔雄迈，在风格上与上面所说的“太康诗风”有显著之不同，更接近建安风骨，代表了当时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

永嘉之后，北方是地方割据的十六国时代，南方是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从西晋末年起，玄言诗开始盛行，到了东晋，其风更炽，统治诗坛竟达百年之久，建安风力荡然无存。这种创作潮流显然是“正始明道，诗杂仙心”的消极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变本加厉，正如刘勰所云：“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心雕龙·时序》）这就是说，那些玄言诗人们把诗歌充作了谈论老庄玄理的哲学讲义，因此其作比较缺乏生活情趣和艺术形象性，故被评家讥为“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我们现在除了可以通过这些作品了解到当时的贵族阶层沉溺于玄风的精神世界的种种情状这一点而外，实在是很难肯定它的艺术品位。不过我们也必须承认，玄言诗人们在写作中往往借自然景物来领略和表现玄趣，因此在一些作品中便包孕着山水诗的成份，这对于后来山水诗的兴起应该说是有所影响的。东晋玄言诗人的代表是孙绰和许询。玄言诗人们也留下了一些形象

性较强、饶有趣味的篇什。

大诗人陶渊明的出现，真正打破了玄言诗弥漫诗坛的局面。陶渊明生当东晋末期、晋宋易代之际，他对中国诗歌史的重大贡献在于最早将田园生活作为诗歌的重要表现题材，为中国田园诗派的开山之祖；继承并发扬我国古代诗歌的优秀思想和艺术传统，将五言诗创作推入一个新的境界。陶渊明田园诗的主要特点是描写农村自然景物，表现自己的隐逸情怀以及躬耕甘苦和丰收喜悦，抒吐对昏浊的时代不满，手法上多用白描，清新巧丽，质朴自然，实开唐代田园山水诗派之先河。但是在当时，陶渊明的价值却几乎被世人所忽略，钟嵘在《诗品》中仅把他列入中品，刘勰的《文心雕龙》则根本没有提到他，这正说明当时文坛的风尚是崇尚雕琢，追求形式，骈俪盛行，因而以质朴、自然为风格标识的陶渊明便注定了遭受冷落。

从刘裕建宋（420），到隋灭陈（589），南朝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在这 169 年的历史空间之中，世族门阀统治的各代政权偏安江左，苟且偷生，一天天荒淫腐朽下去。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诗歌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宋初诗坛，诗歌创作的内容由玄言转向山水，恰如刘勰所言：“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文心雕龙·明诗》）与此同时，诗歌在风格上更趋于华美，刘勰曾经评这种艺术追求是“偏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山水诗的兴起，与江南秀丽的山水以及偏安此间的世族门阀的优游享乐生活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说是他们登临山水、肆意遨游生活的产物，然而不但开创了刘宋一代新的诗风，而且充实了中国诗歌的历史。其时山水诗人的代表是谢灵运，他是第一个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尽管其作常被人讥为拖有一条“玄言的尾巴”，但他毕